

少监材抱岂画史 禹迹曾为帝亲理

——元任仁发的艺术与仕进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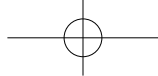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陈秋速

内容提要 南宋遗民任仁发既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也是元代历史上具有真知灼见的、颇有作为的水利专家,著有《水利集》十卷并主持了大量水利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任仁发的艺术思想和水利实学,对于我们了解元初中期江南士人的艺术生涯、生活状态、文化体验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任仁发 艺术史 水利集 遗民文化

任仁发(1254-1327),字子明,号月山道人,先祖为邳县(今属江苏)人,后徙居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今属上海)。据元末诗人王逢记载,任仁发出身平微^①,却少负异才。宋咸淳八年(1272),年仅十八岁的任仁发便中试为举人。正当他前途大展时,却遇宋亡元继的变局,鼎革之际因科举中断、文治不兴,他的科举入仕之途受阻,人生发展也因而转折。大约至元十六年(1279)前后,任仁发以南宋举人的身份,自持名刺往见时任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的游显,被任命为幕府中的宣慰掾,负责整理文书档案。不久,即升至青龙逻官。至元二十五年(1288)升海道副千户,后以功转正千户,任职期间任仁发开始留心水利。至元二十年前后,随从元军远征交趾(今越南),改任海船上千户。成宗年间,因治水有功受到皇帝接见,并于大德八年(1304)升都水监丞。武宗至大元年(1308)除同知嘉兴,二年升中尚院判官,因治大都通惠河有功升任都水少监,并领导了治理黄河决口工程。成宗延祐三年(1316),任崇明知府。英宗至治二年(1322),治理盐官州海塘。泰定帝即位后,与行省朵儿只班疏浚吴淞(又称吴松江)二道、大盈、乌泥二河有功,又加江阴府尹,其后又任都水庸田副使,期间他大兴水利,“计创石闸六,筑塍围八千,浚沟汊千有奇,太湖众水东入于海”。泰定四年(1327),再次主持修筑盐官州海塘。其后,以从三品的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致仕。泰定四年冬卒,年73岁。任仁发一生,得以参预浙西、通惠河、黄河治水,时间跨度达40

^① 此据(元)王逢《梧溪集》卷六《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四库全书本)所记,是其引用“遗老”之口说出,这与任仁发墓志之“父珣,故赠中顺大夫、高邮府知府、上骑都尉,封乐安郡伯”的记载似有出入。但基于墓志语言多谀词,且其父之官为“赠”,亦不知生前逝后所赠,所以本文采用王逢之句。



年，他去世前二年年过古稀之时还被朝廷委以重任，督导淀山湖治理工程⁴¹。任仁发集毕生知识所著《水利集》10卷是对元代中期太湖流域治水研究、实践的系统总结，得到时人和历代治水者的高度评价。可以说，在元代任仁发最终成为了一名以水利专长闻名的技术官员。

究心水利之余，任仁发寄情书画，史称其“书学李北海，画学李公麟”，功力足与赵孟頫相敌。其传世作品有：《出圉图》卷、《二马图》卷、《张果见明皇图》卷、《春水凫鹥图》轴、《九马图》等。

对于任仁发由宋入元的经历，复杂的人生阅历与卓越的艺术修养，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王逢在其《任月山少监职贡图引》中，使用了如下的诗句：“唐称二阎道元吴，今也少监称京都。少监材抱岂画史，禹迹曾为帝亲理。河伯川后备任使，无支祈氏甘胥靡。大德延祐贞观比，犖陆航海填筐篚。鸟言夷面远能迹，少监临古不无以。”较好地表述了任仁发绘画取意特点与寻禹迹以治水的一世功名，更点明了他独特的“跨界”身份。多年来，对于任仁发这样一位“跨界”的学者、实学家、艺术家，学界对其生平介绍、作品介绍、艺术成就评析较多，对于任仁发身份的“跨界”问题偶有认识，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并不多，对其水利实学理论和个人际遇分析却还有待进一步探讨⁴²。

一 常思有为的“遗民”画家

作为入仕于元的南宋子民，任仁发对过往时代、故家园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也使得他对新的王朝——元朝抱有一定的期待，期望新帝可以赏识重用人才，实现文治武功，开创一个新的盛世时代，这种期待在其创作中亦是有所表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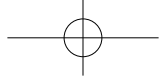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作为江南文人的任仁发，在艺术追求方面以晋唐是则，而他的画作中更暗以大德、延祐与贞观之治相喻，作品多以唐代流行、元代蒙古统治者喜好的“马”为主题，内容上注重“明皇”类题材的作品。任仁发画马以求唐人遗风真意为率，不设背景，设色古雅纯净，用笔工细圆劲，意态生动自然，并深受元朝皇帝的喜爱。他曾奉敕画御苑名马，古人评其画可与唐代曹霸、韩幹媲美，与赵孟頫齐名⁴³。杨维禎在其《题跋月山公〈九马图〉卷》中对任仁发画马的痴迷与成就赞誉不已：“任公一生多马癖，松雪画马称同时。已知笔意有独得，天育万骑皆吾师。”

任仁发的此种艺术追求，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宋元鼎革之际，大部分南宋官民选择了

41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四库全书本。

42 学界对任仁发的研究主要有：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杭州出版社，2004年）对其亦作了较详细介绍。此外，宗典：《元任仁发墓志的发现》，《文物》1959年第11期；沈令昕、许勇翔：《上海县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桑润生：《任仁发和吴淞江的治理》，《上海水利》1999年第2期；刘春燕：《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及其〈水利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杨臣彬：《元代任仁发〈二马图〉卷》，《文物》1965年第8期；洪再新《任公钓江海 世人不识之——元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等，上述论文分别对任仁发墓志、《水利集》及任仁发代表作品等进行了解读和研究。

43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按：王逢与任氏子任贤佐有“姻娅之好”，又“避地相邻”，乃为松江青龙镇的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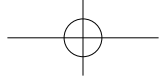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继续在新政权的统治下生存，部分文人、官员被重新聘用与新政权进行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不引起元朝政府的反对与镇压，元初江南文人多推重晋唐，而不主张甚至刻意贬低两宋成就，这一方面是主动与新的统治者蒙古皇帝保持政治立场上的一致；另一方面，希望以同样为出身异族的晋唐统治之法，来引导新的蒙古统治者知人善用、积极有为，一改两宋外辱不断、国势不强之弊，而塑造出新的盛世。抱着对新时代的期待，任仁发于元初画了其传世鞍马画代表作《张果见明皇图》，描绘了唐玄宗李隆基与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其弟子相见的传奇故事。这是当时流行的道教故事画，该画选择了盛唐的宫廷活动为画面背景，强调了道教仙人张果老和一代君王的相互关系^①。该画以道教仙人来主动求见世俗的唐代玄宗皇帝——明皇，仙人法术所养之小驴更是主动从袋中跃出“求见”明皇的画法，更彰显了画家任仁发希望能被上位者赏识、积极有一番作为的内心世界^②。

但入元后，任仁发娴熟的书法绘画功夫、闻名乡里的英才声名、积极上进的入仕态度等，都不能使他在新朝得到应有的地位。正如其姻家、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王逢在《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中所说，宋元“革命”后，走投无路的任仁发以南宋举人的身份，自带自刺拜见元代大将游显，“袖一刺见游平章。奇之，辟宣慰椽……”任仁发在元代仕途的起点是管理文档的宣慰椽这样微不足道的胥吏之职，这段经历给了任仁发深深的刺激。因此，任仁发画马，除有此雅好外，更多地还是表现他怀才不遇的现状与壮志难酬的叹惋，亦有以马自比，以画马为进身之阶的做法，因此其意不在于画马本身，而是其政治意识和个人情绪的表达。在这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二马图》，作者用艺术对比手法，描画了一匹无缰肥马和一匹束缰瘦马，并在跋语中写道，“肥者骨骼权奇，索一索而立峻坡，虽有厌饫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蹄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啮枯草而立风霜，虽有终身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并发这样的感叹：“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淤滥之耻欤？”可见任仁发以二马为喻，分别指元代社会中那些养尊处优却目无百姓、无所约束、贪食民脂的官员，以及心忧天下、骨骼清奇却处处受缚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最后落得瘦骨嶙嶙的良臣，这更是他对自身怀才不遇遭际的写照，及作者希望自己要以前者为戒、以后者为榜样的高洁的人生态度。

任仁发一生，有着强烈的以艺术求仕进的情结。除了作《张果见明皇图》进献元朝皇帝，其后又曾奉诏为帝画马，其所绘《职贡图》亦似为奉诏而作，《熙春》、《天马》二图更为仁宗所赏识并被诏令入藏秘监。但总的来说绘画并没有给任仁发带来仕进上的机遇。因此任仁发将这种追求与情结寄托在子孙后辈中。史载任仁发有共有子女12人，其中儿子4人，分别为任贤才、任贤能、任贤佐与任贤

① 洪再新：《任公钧江海 世人不识之——元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

② 任仁发画道教画，其实也可能与他们家族的宗教信仰有关。从碑志资料来看，任仁发家族奉道教是有迹可寻的，任仁发子辈中，其次子任贤能号“云间子”；四子任贤德为人清雅、不意仕进；任仁发孙辈中任贤能四女名妙宁、妙静、妙严、三奴，亦是道教常用之名姓。此可待进一步研究。



德¹。任仁发长子任贤才(字子昭)极具艺术天分,任仁发曾亲带其游历京师,并助其自荐。黄玠在《送任子昭北》诗中说:“天上神京春色好,兰台玉带多俊髦。龙江公子少年日,乃翁携之与游遨。翰墨之余及丹青,譬如鲁削非凡刀……亟亟上书自荐达,一刺民瘼针如毛。”²此后贤才以丹青名满京都,并于泰定二年(1325)获任秘书监辨验书画直长。任仁发次子任贤能(字子敏,1285-1348)曾任宁国路泾县县尹、兼劝农事、兼知渠堰事。他亦具有相当艺术天分,并曾有过入觐进画的经历,墓志载其“大德、皇庆间入觐进画,而被赐金段旨酒”。此外,其三子任贤佐(字子良,约1287-1358后),擅画人物,尤长画马,继承父风,与元末著名诗人王逢交好。贤佐亦曾于至正二年(1342)拜进《三骏图》,卷尾自识:“至正壬午季秋,叔,九峰道人作此图拜进。”叔字为家中排行第三之谓。九峰位于上海松江西北,古称凤、陆、余、神、薛、机、横、天、马、昆九峰,为当地全真教信徒活动中心。贤佐信道教号,九峰道人之号始见于此卷。因此卷无作者印记,似为进贡画之习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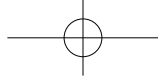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任仁发家族是元代青浦当地颇有成就的家族,在任仁发侄儿任良辅墓志中更是自诩任氏家族“家世业儒”,同时他们一家又颇有经世济民之道,并通过与当地官宦世家、儒学名家皆有通婚,任仁发的多个女儿亦与当地名门望族联姻,孙辈中与异族通婚者亦多³,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些技能和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不为的。在元代,像任仁发这样有文化的南人士人家族,如果没有特殊的途径,如善绘画、知水利等具体技艺,要想在求取仕进之途上有所发展,其道路是窄且多艰的,根本没有正常的渠道可言。其例如,任仁发侄儿任良辅曾先后任青龙镇儒学教谕、太平县儒学、平江路儒学,后升信州路叠山书院山长,时间长达几十年,但在他“将登名铨曹”时,“适有疾,卒于至正十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⁴。从这段记载来看,如果仅凭儒业,可能六十二岁才能“将登名铨曹”,真是兀兀穷年,不知老之将至,想要在仕进上有所发展是绝对难行的。这与两宋时儒士入仕的便捷通畅途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对于“遗民”任仁发来说,这种巨大而强烈的反差肯定会让他十分矛盾和痛苦。这样的时代和心理背景,对我们认识任仁发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1〉 任仁发四子任贤德(字子恭,1289-1345),据碑志记其“尤长于水利,家传之学,人皆爱慕而敬服焉”,因治水有功曾有会为官,但为人清雅,不意仕进,对此机会托以疾,辞不就(王素《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下)·元故提举任公墓志》,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20)。

〈2〉 (元)黄玠:《弁山小隐吟录》卷二,四库全书本。

〈3〉 任氏家族之婚姻与交好,是元代江南文人士族、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样本,散见于任氏墓志及相关记载中,资料不少,尚待研究。

〈4〉 王素:《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下)·元故信州路叠山书院山长先考任公(良辅)墓志》页21,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二 卓有成效的治水专家

与其绚丽的艺术成就相比，任仁发更是一名杰出的水利专家。元末高官兼文坛巨擘康里巎巎在品评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跋文中，亦发出这样的感叹：“月山之为人，多才而智，有益于世。至于水利钱法，皆深造极致。惜乎不遇于世，世之士大夫皆言其精于画马是矣。然因其不遇，但知此而不言彼宜其尔也。”由之可见，在康里巎巎眼中，任仁发的水利实学也应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

任仁发一生孜孜于太湖水利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至元二十一年(1284)，时任海道千户长的任仁发就曾向元廷上书，建议治理太湖、练湖(丹阳)，淀山湖和疏通河港，但未被采纳。至元三十年时，任又积极参与当时的治水讨论，其治水理念当时虽未实行，但已经得到认可。此后，成宗朝始，在任仁发等的建议下，先后于大德二年(1298)、五年、八年成立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监等组织对太湖平原水利加以治理。大德二年，元廷专设浙西都水庸田司于平江¹，大德八年春二月，又设都水监于平江路，职掌吴淞江的水利工程²，对此，文廷式也有记载“专一提调田土河道”³。在元朝，成宗大德八年，英宗至治三年，泰定帝泰定二年、三年，明宗天历二年，文宗至顺二年，顺帝至正元年、七年、二十年、二十四年等，元政府曾一再在平江、松江等地开浚渠道，整治圩田⁴。

从成宗初年开始，任仁发负责了多项水利工程，主要有以下几项。

成宗大德八年(1304)的吴淞江治理工程。“据中书省臣言：‘吴江、松江实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淤塞良田百有余里，况海运由是而出，宜于租户役万五千人浚治，岁免租人十五石，仍设都水监以董其程。’从之。”⁵“以海道千夫长任仁发言命行省平章开吴淞江，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旧江，东抵嘉定石桥洪，迤迳入海，置木闸。”⁶此次浚治吴淞江名义为平章彻里全权督治，实为任仁发负责。同时，在任仁发的建议下，元朝政府特设了行都水监⁷。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为平章彻里所作的传记将全过程细叙：

又，《吴松江记》云：岁辰（注：指大德八年），前海运千夫长任仁发以吴松江故道

〈1〉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2〉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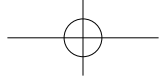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3〉 (清)文廷式编：《大元官制杂记·都水庸田使司》，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乾隆江南通志》卷六三《河渠·水利治绩·苏州府、松江府》：浙西地区元代修建田围甚多，以平江路言之，共有田围8829处，其中吴县917围，长洲县1788围，常熟州1111围，吴江州3268围，昆山州1645围，嘉定州100围。“延祐四年行经理之法，悉以上、中、下三等，分别计亩起科苗税”(洪武《苏州府志》卷一〇《田亩》)。均为四库全书本。

〈5〉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6〉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任仁发水利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7〉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



堙塞，使震泽之水，失其就下性，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概[慨]然上疏，条其利病疏导之法。中书省以闻，特命平章彻里，公董其役。公相其山川形势之宜，高深广狭之度，工役之数，钱谷之费，畚鍤之用，饮食之需，命民索陶乘屋，厚高秸以防其卑湿，为医药以防其疾疫，时作辍以防其倦怠。上以诚感下，下以诚应上，民乃呼四集，乐于趋事赴功。始于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旧江，东抵嘉定桥洪〔浜〕，迤迳入海。长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阔二十五丈；至九年二月毕工。复置闸窳，启闭以时，物无疵疠，民无夭阏，而事竟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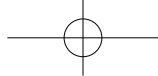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从记载可以看出，工程从大德八年的十一月起至第二年的二月结束。共开浚吴淞旧江38里余，深1.5丈，阔25丈。大德九年又在江中置闸10座，以阻潮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次修浚虽然没有改变太湖流域原来的水利体系，只是对出水口进行了浚深和开阔，但是通过开浚与黄浦相通的塘浦，让黄浦水系水势大涨，此后成为最为重要的水道。民国《太仓州志》对元代治理太湖积水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指出元代疏浚苏、松、嘉地区的积水，“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有所建树。

大德九年任仁发主导淀山湖治理工程。淀山湖为西北吞受太湖来水，东南泄水于吴淞江故道的重要湖。但入元后，此湖即被不断侵占，致积水不泄。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时，曾拟开此湖，却因为权豪势族之阻挠，最终“止开新港三条，约阔三十余丈，比之所占顷亩，千中不及其一”，因此既不能泄汪洋之湖水，更不能阻汹涌之浑潮，因此“遇涝则泛涨逆流，值旱则纵横妄注，日就月将，以致吴淞江故道堙塞，下则无水灌田，为嘉定、上海诸处之旱灾，上则无地蓄水，为平江、嘉兴等路之傍溢，复使浙西百姓悉被其殃”。而“元占权豪，坐享其利，自至元三十年至今，水灾开除官粮一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七石，民租不可胜数，为害如此”。因此，成宗大德九年(1305)，命提调官江浙省平章政事彻里荣禄开复淀山湖，对于所占湖中，“水高数尺即可成湖者”命侵占之家，“自愿开挑为湖”，并严禁复占为田，对于所侵占的高阜之地，收归为官田，“令种户承佃，自行上仓输纳官粮，及将已开为湖内佃户从宜标拨系官田荡，安置租种，勿致失所”^②。大德十年，任仁发在前有基础之上又再修浚赵屯浦、大盈浦、白鹤江、盘龙江、旧江等。“计吴淞江东南黄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万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淮寺东止一千六百丈，永淮寺东起至赵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赵屯浦口起至陆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陆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通计长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丈”^③。对此，地方志中如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也有记载。这些工程排除吴淞江及

①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武宁正宪王》，中华书局，1996年。

②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四《大德九年三月提调官江浙省平章政事彻里荣禄开复淀山湖》。

③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苏上·任仁发水利议》，此在嘉庆《松江府志》卷一〇等地方志中也有记载。



周围湖泊的积水，让太湖出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主导浙东海塘的修复和重建工程。海塘是太湖东南沿海地区抵挡潮涨侵地的最重要手段。元代自大德三年，海宁县捍海塘崩坏，延祐、泰定年间常为海患，故庸田副使任仁发、都水少监张仲仁发动两浙百姓修筑，到天历初始罢此役¹。在技术上，元代海塘重视塘基、材料上以石料代替原来的土石堆料、并重视对海塘背面的保护。元代海塘塘基座一般先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以使塘基更为坚固，然后用条石纵横交错、层层垒砌地筑起海塘，使塘更为坚固，同时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强度和抗潮性能。元代在杭州湾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石塘修建，使太湖下游海塘体系基本成型，并奠定了明清石塘的前身。

英宗、泰定帝期间主持对太湖东部河道系统的整治。文宗延祐初年，年近六十的任仁发出任崇明知州，此后又调筑盐官州海岸，并主导了丹阳练湖水利工程。英宗至治三年(1323)，江浙行省派员对宜兴、常熟等地五十五处河道进行浚治。华亭县、上海县等地也对境内的河道做了浚治。泰定元年(1324)时，太湖流域的整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该年，“江浙省言，吴淞江等处河道壅塞，宜为疏浚，仍立闸以节水势”。此事专委左丞相朵儿只班负责，为确保工程成功，又启用了退休状态的、年逾七十的前都水任仁发来具体督导，“江浙省下各路发夫入役，至二年闰正月四日工毕”，这次工程动用四万民工，“计创石闸六，筑塍围八千，浚沟汊千有奇，太湖众水东入于海”²。

任仁发的治水思想从源头而言，主要有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等的理论与实践，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要手段，认为“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立，缺一不可”³。元代时作为太湖排水入海最重要的通道吴淞江淤塞严重，因此任仁发的治理方案主要是围绕疏浚吴淞江展开⁴。他将吴淞江及其周边地区的圩田区分成四个部分：吴淞江南岸47河；吴淞江北岸56河；扬子江南岸41河；冈身入海地带32河⁵。当然，他也充分注意到吴淞江严重淤塞的历史与现实，如当时浙西吴县就是因吴淞江淤塞而形成的，彻底治理吴淞江就意味着要将吴县居民移往他处，以恢复古时水道，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又认为，即使不能完全治理好太湖水利，也必须尽量减少吴淞江的继续淤塞。他还认为，以元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吴淞江纵令废弛，合将太湖百川之水疏浚”⁶。

任仁发将开河、筑堤、置闸结合起来的“治水三法”和以吴淞江为重点的方案，因其系统性和可行性较强，得到了当时人和明初人的较高评价，成为当时治理太湖水利的指导思想。但在明代，吴淞

1、 《吴中水利通志》卷五《杭州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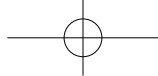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2、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这次工程较为巨大，因此《元史·河渠志二》中亦有记载。

3、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二。

4、 这种通过疏浚吴淞江来治理太湖水灾的思想是元代水利专家的主流认识，但在具体做法上因人而异。

5、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七。

6、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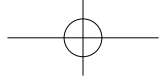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江淤塞更甚，复古水道、顺通吴淞江已是不可能的事，故明初之后疏导太湖之水入海的工作是疏导吴淞江水由浏河入江，并导汴泖河之水由黄浦入海，而旧吴淞江最终完全淤塞。可以说，明代以疏浚太湖入海、入江通道为主治理太湖的方法是承继于任仁发治水理论的。

三 毕生积累写就《水利集》

任仁发通过实地考察，并对前人的水利文献进行研究，针对当时的太湖流域的情况，结集《水利集》，蒐集宋元历次治水公文函件等史料，详述治水工具等项，并深入研究太湖水情，指出治水要尽人事而不抗天时，并综合得出治水三法：“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设遇水旱，有河港、围岸、闸窦，堤防而乘除之，自然不能为害。”^①其中卷二《水利问答》部分，系统阐明了任仁发对太湖水利的认识、治理原则、治理困难所在、标准，是其太湖水利治理理论的综合体现。

《水利集》是任仁发治水事业的真实记录，是其水利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目前研究任仁发水利实学思想和元代初中期太湖水利的最重要著作，因广受关注而多为后世所传抄。在传抄过程中，难免产生各种错漏，因此《水利集》各版本的内容不同，详者统其十卷，而略者仅记《水利问答》部分。除此以外，在各种经籍志中，此书书名也很不一致，如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载为任仁发《水利书》十卷，倪燦、卢文韶《补辽金元艺文志》则称任仁发《浙西水利集》十卷，《续通志》则称《浙西水利议答》十卷，又名《水利文集》。1996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了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明抄本《水利集》十卷（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史部》221）。据抄本言：“《水利集》十卷，前七卷为元刻，后三卷即阁中，亦是抄本矣。”因此，此明代抄本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但即便如此，此书的价值依然巨大，除对研究元代太湖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特别是对研究任仁发所主持的水利工程有重要参考作用外，其重要价值还有：（一）完整保存了元代两次“水利集议”的会议记录与决议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中期实施水利工程的具体流程。（二）保存了大量政府公文，对我们研究元代政治运行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三）《水利集》中多处引用《宋会要》等重要史料，并对元代其他水利专家如张桂荣、潘应武等的治水理论进行大段摘引，起到了文本保存的意义，这为我们全面了解元代水利思想提供了参考。（四）《水利集》相关记载亦可补《元史》之疏，对研究元代水利机构沿革具有重要价值。如前所述，元代官制史料保存不够，如元代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监的沿革情况，仅见《元史·百官志八》，而《元史·百官志八》实际上是明人据《经世大典》修完《元史》各志后的补编，反映的主要是顺帝朝情况。《水利集》则保存了元世祖到泰定帝时太湖水利的丰富史料，其中特别是对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监沿革的记载等，可补《元史》相关部分的疏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①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二。



任仁发《水利集》是元代治理太湖水利的集大成之作，与以治理黄河为主要内容的《河防通议》等，同为元代水利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的文本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该书是继宋朝郑亶父子《水利书》之后，记载太湖水利又一重要著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明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多有此书的内容引述。

四 任仁发所代表的江南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任仁发自小出身于葭菻茅篴之所，以捕水禽野鸡为业，可谓世家卑微；入元后又以宣慰掾这样低微的胥吏之职入仕，可谓起点极低。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平事业，通过一步一步奋斗，以卓识远见之才、踏实肯干之能，先后历任海道千夫长、都水监丞、庸田司副使、都水少监，最后以浙东道宣慰副使致仕。

任仁发的治水生涯从1284年第一次上书朝廷而不得实施，到1324年以年过七十的高龄仍被征用来督导淀山湖水利工程，时间跨度达40年，其所主导的系列治水活动，取得了时人所瞩目的成就，亦创造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时的治水高峰，他十卷本《水利集》亦为世人所尊重。因此也可以说，任仁发一生是一个成熟而受到重用的技术官员。但同时，这个身份，也使得他一直蹉跎于元代官僚体系的中下层，扮演着亦官亦吏的角色。这个角色，与他少年入举的荣耀自身及卓于常人的远大志向不甚匹配，而以其精于书法绘画、堪与赵孟頫齐名的精深造诣而言，其所获名誉也相差甚远。就艺术创作而言，任仁发的作品甚至没有得到当时同乡人夏文彦的重视，在《图绘宝鉴》中都没有出现；而任仁发的治水观点，在泰定帝时亦曾遭到周文英等的抨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仁发的艺术造诣和水利思想虽负有盛名，但在同时代人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地位。直到元末时，他们家族通过与王逢、别里怯家族、康里巎巎家族等当地高官显宦或文化名家的联姻，任仁发的影响和地位才渐渐显现。在元代，任氏家族不断壮大，其后代中亦有为儒长为民官或长于丹青者，但究竟无人在科举上有所创举，此亦可见元时江南士人之生存状态。但无论如何，身为南宋遗民的任仁发，他没有在人生中沉沦，而是在实学与艺术特长中找到契合于时代的平衡点，也显示了在变革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顽强的生命力。任仁发的艺术修为与水利实学相互促进，紧密结合，显示了蒙元时代江南知识分子生存之共性特点。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 露)